

中国越学

ZHONGGUO YUEXUE

【第三辑】

王建华◎主编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
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
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
有峻領茂林脩竹又有清流
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
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中国越学

ZHONGGUO YUEXUE

【第三辑】

王建华 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越学·第三辑 / 王建华主编.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4

ISBN 978-7-5117-0760-4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文化史—研究—浙江省
IV. ①K29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1208 号

中国越学·第三辑

出版人:和 葵

主 编:王建华

责任编辑:曲建文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邮编:100032

电 话: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53(编辑室)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www.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16

字 数:484 千字

印 张:21.5

版 次:2011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5.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顾 问 李学勤 陈桥驿 章培恒 董楚平

编委会主任 王建华

编委会成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能宪 史晋川 卢敦基 叶 岗

朱志勇 肖金城 寿永明 李永鑫

陈伯海 陈望衡 邵 鸿 周一农

费君清 高丙中 高利华 曹锦炎

陶 侃 章 融 谢一彪 葛剑雄

董乃斌 曾 骅 梁 涌 潘承玉

主 编 王建华

执行主编 潘承玉

副 主 编 谢一彪 章 融 潘承玉

责任编辑 钱汝平

目 录

越地城市史研究（纪念绍兴建城 2500 年）

古城大庆二千五百年	陈桥驿（3）
一座中国传统城市的 2500 年	
——绍兴城市史概述	任桂全（8）
传统越文化与绍兴城的发展	陈国灿（19）
文化传统与绍兴城市精神	乐承耀（23）
试论绍兴越都城的建立	钱茂竹（33）
山阴古城与吴大城的比较	戈春源（41）
越国复兴时期的城邦式经济体系	封晓东（48）
论隋唐时期的越州都督府	艾 冲（56）
南宋绍兴城市的发展	徐吉军（65）
从吕祖谦《入越录》看南宋绍兴城市风貌	沈 勇 龚剑锋（79）
晚清绍兴与上海的经济联系述论	戴鞍钢（92）

地域文化新视野

泰伯仲雍开吴对中华文明史的贡献	黄胜平 姜念涛（103）
“南方夫子”言偃三探	金其桢（108）
吴越崛起的根本原因	董楚平（117）
永和兰亭之会对江南文化发展的历史作用	叶 岗（120）
吴文化与齐文化	
——透过晚明诗坛看吴文化的独立性	朱丽霞（129）



晚明以降环太湖区域的文学艺术变迁，一个值得深入关注的

学术领域	潘承玉 沈松勤 (139)
清代乾嘉时期江南学术文化的三大特征	罗炳良 (150)

越地文化与学术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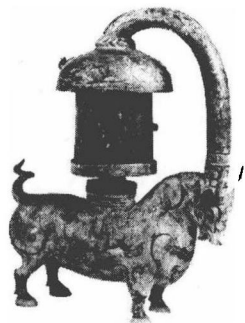
越文化精神的本质特征	章越松 (163)
王充与汉代《诗经》学	吴从祥 (171)
《宋元学案》中浙江学案研究	陈爱平 (179)
宋代越地的文化家族	
——以明州鄞县史氏和越州山阴陆氏为中心	高利华 (189)

越地文艺研究

“咏絮才女”谢道韞考辨的文化意义	周淑舫 (201)
吴越山水铸诗魂	
——论吴越文化对骆宾王边塞诗的影响	郑元英 王敦琴 (214)
中国古代文学中苏小小的形象意味	李晓红 (222)
刘基：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	
——基于小说《英烈传》的文本解读与考察	张宏敏 (247)
“油滑”：《故事新编》的艺术方式与文体	
——从越文化视野透视	王晓初 (259)
朱自清对“赋、比、兴”的阐释与运用	李先国 (281)

越史新探

越国具铭剑述略	孟文鏊 (291)
曲水流觞迹何在？	
——关于兰亭遗址之谜的探寻	毛万宝 (305)
郑所南与永嘉的情缘	陈福康 (314)
蒋士铨在绍兴蕺山书院山长任上	余德余 (319)
区域人文环境与商办浙江铁路	王道 (328)
《中国越学》征稿启事	(337)



越地城市史研究

纪念绍兴建城 2500 年



古城大庆二千五百年

陈桥驿

对于绍兴古城，2010年是个划时代的年份。因为越王句践是在公元前490年，也就是2500年前，从会稽山区出来，在离山麓不远的这片孤丘平原上建立这座都城的。今年正是这座古城建立的2500周年。当时，在以汉人为主的平原地区，都城当然早已出现，但在被先进的汉人称为“南蛮馐舌”（《孟子·滕文公上》）的落后地区，建城立都的事是相当罕见的。所以在以后的整个华夏境域中，越人建立的这座城邑，无疑也算得上是座历史上的古城，是越人和汉人都可以自豪的。绍兴是我的家乡，我当然亦与有荣焉。

对于建都立邑之事从事研究，不仅是一种历史，同时也是一门学问。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我与他们之间常有联系，其中也有几位热衷于研究绍兴的。^①这就说明，对于这座名城，其城邑的建立，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现在我们国境内的古城，多数都由早期的汉人建立，但绍兴却始建于越人。《汉书·高帝纪》：“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说明由朝廷颁令建城的事，要在绍兴建城以后很久才见于正史，足见在郡县制成为行政区划的基础以后，还有不少县邑是没有城垣建筑的。所以，汉高祖在其建朝的元年（公元前201年），颁布了这条命令。但绍兴这个远离中原的地方，却与当时中原的其他许多地区一样，已经出现了这座古城。即此一端，就值得我们从事研究。

这座在《越绝书》上称为“句践小城”和“山阴大城”^②的古城，其所以能够在2500年前诞生，当然有值得研究的原因和过程。《越绝书》是一部可信的、经过东汉初

^① 例如美国首席汉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就其执教的名校斯坦福大学建立了一个“宁绍研究所”，出版了中国历史城市名著《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就率团访问绍兴和宁波，省里由我作陪。他主编的这部名著，已由我组织一批擅长英语的学者（叶光庭主译）译成，中译本名《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由中华书局于2000年出版。全书60余万字，施坚雅为中译本写了序，我除了作为全书校者外，还写了长篇《后记》。

^② “句践小城”是其即位第七年（前490年）年末所建，确实无疑。但“山阴大城”在《越绝书》中未曾记叙是当年所建，且其规模较大，恐系次年完成。



学者整理加工的先秦越地古籍，对此我已另有文字考证^①，这里不作阐述。公元前490年时，山会平原还在第四纪最近的一次称为卷转虫海退的过程中，山会平原的范围还不小，建城不可能远离山麓，选择这样一处孤丘罗列的比较高坦的地区，或许就是范蠡的设计：“今大王欲国树都，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吴越春秋》卷五）句践在今龙山南麓建都之时，这个地区的孤丘还有不少，其中有的在我们童年时还存在。初建时的越城当然简陋，城垣是以后随着时代而不断拓展的，这个过程中就夷平了不少较小的丘阜，但其中最大的三处，即龙山（76米）、戴山（52米）和塔山（32米），却能长期挺拔苍秀，成为二千五百年来的见证和座标。

我国的不少古代名城，特别是黄土高原上建城最早、声名特大的名城，我在上世纪80年代都作过一些文献研究和现场考察，并撰写过一些文章，主编过几本文献，所以稍有了解。虽然在这些文献上我们都以古都相称，有的并且使用同一的地名，但实际上它们多是在一个地域上不断播迁的。例如西周的丰镐，秦的咸阳，汉的长安，我们现在都把它们作为一个古都，但其实并不建立在同一地域之上。东周的王城和汉的洛阳，情况也正相同。但绍兴古城则与众不同，尽管城市不断拓展，地域不断扩大，但三山屹立，抬头可见，成为城市的稳定标志。这在我们的许多古城中是一个不多的例子。是古今都值得自豪的。

前面已经提及，在中国的许多历史名城之中，绍兴是为数不多的由汉人以外的越人创建而年代确实可考的。所以这里有必要把兴建这座古城的越人部族作一点介绍。中国是个由许多民族融合而成的大国，在远古时代，这些民族的情况多是前代人的传说，并不属于信史。这中间，以黄土高原及黄河中游为聚居地的汉族是发展最早和文化最高的，他们在殷代（公元前11世纪）就有了文字（甲骨文），显然是国境内所有民族之首，也是以后中华民族融合过程中的核心。

越族从其分布的地域来说也是一个大族，但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都不能与汉族相比，所以被汉人称为“南蛮馃舌之人”。越人的语言与汉人不同，这就是“馃舌”的来由。越人没有文字，与汉人交往以后，越人中的上层人士才学习汉字。汉人则按越语迳译，所以后来作为族名和国名的这个“越”，《史记》诸书作“越”，而《汉书》诸书则作“粤”，其实是一音二译而已。对此，我在为《绍兴方言》^②卷首所作的序中已有说明。

汉族是中原大族，众望所归，越人当然早已有使者北上交往。今本《竹书纪年》在周成王二十四年条下所载的“于越来宾”就是“于越”这个名称最早见于记载的汉人史籍。往年王国维曾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二卷，经过他的逐条考证，论定《今本》多“后人搜辑，其迹甚著”。又指出：“始知今本所载，殆无一不袭他书。”王国维是个著名

^① 我的研究生乐祖谋点校的《越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卷首有我的长篇序言，考证此书来历。我并另有《关于〈越绝书〉及其作者》一文，发表于《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以上二文均收入《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②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出版。



学者，所言当是事实，《今本竹书》显然不能与已经散佚的《古本竹书》相比。不过王氏也据其考证说明：“其不见他书者，不过百分之一。”而周成王二十四年下的此条“于越来宾”，即在此“百分之一”之中。所以《今本》此条，显然价值不凡。而且作为对历史传说的研究，还应和其他有关文献核实。我往年曾撰有《论衡与吴越史地》拙文^①，指出《论衡》在《超奇》、《异虚》两篇中，都曾记及于越向西周献雉的事——《超奇篇》说：“白雉贡于越。”《异虚篇》记得更为详明：“周时，天下太平，越尝献雉于周公。”这项资料的特别可贵之处，是它和《竹书纪年》的不谋而合。我在该文中加意说明，《论衡》的这两篇，当然都是王充在吴、越地区耳闻的记叙而绝非来自《竹书》。因为在王充撰写《论衡》的时代，《竹书》尚深埋于汲冢之中，所以我们把王充在越地耳闻的“白雉贡于越”与《竹书》的“于越来宾”加以对比，二者或许就是同一历史事件。说明早在公元前 11 世纪之末，于越作为一个边疆民族，已经对中原大族有所朝聘。也就是说，已经开始吸收中原汉族的先进文化。这个过程当然是在一段相当长期的时代中渐进的，不可能像兴建一座都城地有一个确实的年份。

现在再回过头来议论绍兴建城的事。在远古分布于我国境的各族之中，越族是一个濒海民族，为此，在议论这个问题时，就需要涉及一个称为古地理学^②的学问。前面记及远古越人把自己的国族以汉字译成“越”（或“粤”）。我曾于上世纪 80 年代起多次应邀到日本担任客座教授，发现日本也有很多称“越”的地名，而且我在上述为《绍兴方言》所作的序中提及，在日语之中，有好些语音显然与古代越语相牵连。此外，在中南半岛有“越南”国名，他们国内与“越”（或“粤”）发音近似的也有不少。这个语音，而且远到南洋，说明在国境东部和南部，曾经有很长一段时期有“越”（或“粤”）人的流散和分布。这种事实，就涉及到古地理学的问题。因为在整个第四纪，南方沿海曾经发生过几次海进和海退的自然环境的变化。现在，由于地质科学和古生物科学等的发展，这些过程都不必用传说和神话进行虚构，而是可以用现代技术测定年代。日本有不少对这个过程很有研究和兴趣的学者，他们很希望我在这个问题上作一番研究。由于国际学术界同行的要求，所以我在文献查阅和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写了若干文字，于国际交流期刊《文化交流》^③发表了一篇《越人横渡太平洋》的论文，文内按学术界对第四纪古地理的研究，附入《假轮虫海退时期今浙江省境示意图》和《卷转虫海进时期今浙江省境示意图》两幅插图。因为按照现代第四纪科学的研究，第四纪是始于距今 250 万年的一个很短的地质时期。在这期间，地球上间隔性地发生暖季、冷季以及与此相应的间冰期和冰期的交替，因此同时出现地球上水体的变化。与冷季及冰期相应的是海陆冰川的发展和水体的下降，在地质学上称“海退”。而与暖季和间冰期相应的是海陆冰川的消融和水体的上升，地质学上称为“海进”。我在拙文中插附的这两幅“海退”、“海进”示意图，因为利用了学术界古地理的研究成果，所以获得了日本同行学者的赞

① 《浙江学刊》1986 年第 1 期，收入《吴越文化论丛》。

② “古地理学”（Palaeogeography）是一门研究地质时期海陆变迁的科学，不同于“历史地理学”。

③ 《文化交流》第 22 辑，1996 年。



赏。按此文的《假轮虫图》，其时在距今约 15000 年的冷季，即所谓冰期，海陆冰川积贮深厚，海面下降，今省境陆域甚广，海岸线基本上在大陆架上，今宁绍平原与舟山等许多外岛互相连接，宁绍平原上的越人部族，已经从采集、狩猎发展到农业耕作。但到了距今 12000 年的全新世，第四纪的另一个暖季开始，海面又逐渐抬高，大陆与岛屿次第分离，许多岛屿淹入海域而陆域面积也因海水的入侵而不断缩小。这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卷转虫海进”^①。在这次海进的几千年中，越人因避水而分散，这个过程，我已撰有《越族的发展与流散》一文议论^②，此处不再赘述。对于越人来说，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当然是一种挫折。漂洋出海的一大群姑且不论，原来的宁绍平原上的越人主要部分，随着海水的不断内侵而自北向南迁移，经过多少年代，最后退缩到山麓边缘（即河姆渡一线）。而海面仍然继续上涨，越人的主体最后进入浙东山区，而以会稽山区为部族中心。“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吴越春秋》卷六）。在生产和生活方面，显然都比在平原时代有了倒退。其中最早一代进入山区的越人，当然从他们前辈口中知道海水吞噬平原的故事。而这种故事，在后代越人中口口相传。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说：“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③这显然就是在山区艰难度日的越人，按他们前辈的传说，希望有一位神明，替他们驱走海水，把平原交还给他们。

我之所以在序中记叙这一段海进的故事，一方面是因地质科学不是神话传说，是有年可考的事实。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说明，越人的经济和文化，原来比汉人落后。而这一次海进使他们丧失了一片以往从事耕作的平原，显然更拉大了与汉人之间在各方面的差距。但人们盼望的这位后来被整个华夏族群所传颂的神明终于到来，海退开始，平原逐渐显露并扩展。越王句践随即于 2500 年前跨出山区到平原建城立都，此事与越人部族中流传的其他故事不同，是后代人们完全可以信赖的历史事实。所以我说对于绍兴，2010 年是个划时代的年份。不仅海内外绍兴人士值得重视，在我国的城市史上，也是一件必须记叙的信史和大事。因为这座古城的兴建，在时间上确凿无讹，而在城垣位置上，如上所述，由于龙山、戴山、塔山的三足鼎立，在我国的许多古城中，也有独特的风格。句践兴建此城时，城垣与范围当然狭小，在以后的年代中不断扩展。但作为城市座标，这三座丘阜，今后必然万世长存，让后人永远铭记。随着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绍兴在今后当然还要长足跃进。但后代人开卷有史（《越绝书》），这座古城和公元前 490 年这个建城年份都将永垂不朽。

城市学这门学问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中发展起来的。在每个城市的诞生和发展历史中，都包含了不少传说，其中有的更具有神话的性质。但是由于它们流传已久，意义深远，所以即使在科学测年的技术发展到了可以把一粒砖屑、一片粗陶、一段碎木都能测

① 第四纪的“海进”、“海退”，地质学界均按当时地层中大量存在的原生动物有孔虫（Foraminifera）命名，“假轮虫”、“卷转虫”等名，都由此而得。

② 《东南文化》1989 年第 6 期，收入《吴越文化论丛》。

③ 《古史辨》，北平朴社民国十五年（1926）出版。



定其年代的今天，对每个城市中流传的各式与现代城市科学毫无关系的掌故，我们仍然不必排斥，因为它们在历史、人文、道德、宗教、习俗等其他许多方面，都存在各自的价值，这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是，凡是符合于科学的城市学内容的，我们尤其值得重视和研究。对于绍兴来说，2500年来，从建城的时间和城市的分布，都是科学的城市学内涵，我们既要纪念这个划时代的建城年份，也更要研究绍兴这部价值不凡的城市史。

我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才从事历史城市研究的。开始涉足于此，对上述两个方面都并不明确，所以虽然应出版社之邀，主编了几本有关文献，但思想上对不少问题实在多没有解决。直到1989年，应日本国立广岛大学之聘作客座教授，开设《比较城市学》课程，这半年的教学工作，让我在城市学的领域中有了不少新的认识，所以在后来主编的《中国都城辞典》^①中，对这两方面的概念都作了若干阐述。现在，国际城市化的进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等因素，正在不断加速，我一时无从查获当今全国和全世界已经有了多少能排入城市之列的数字。但是，有这么一个城市，它有古老而确切的建城年代，具体的建城位置，永远延续的城市座标，这个城市就是绍兴。它的二千五百年建城大庆，不仅是海内外越人都必然关注的大事，也是城市学者都值得研究的课题。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

^①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一座中国传统城市的 2500 年

——绍兴城市史概述

任桂全

2010 年是绍兴建城 2500 周年的喜庆之年。这座始建于越王句践七年即公元前 490 年的越国都城，虽然只是我国历史上 220 多个古都所在城市之一，^① 可是当极大多数都城从地平线上消失，成为钻探、发掘、考古对象时，我们回望越国都城，在时隔 25 个世纪之后，不仅地理位置不变，古今城址相合，而且还在继续使用，仍然是当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在我国古都发展史乃至城市发展史上，都称得上是个奇迹。对于城市史研究来说，利用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进行研究，固然很重要，利用越都城这样饱含古都肌理的实例进行研究，同样是十分重要的。正象陈桥驿先生所说：“在目前我国存在的古老城市中，这个城市（指绍兴）还有大量的古迹未曾泯灭，有利于现场的勘察。譬如，在城内，自从南北朝末期划分的山阴、会稽两县的县界，至今还有很长段落依然存在，而从汉晋以至唐宋的地名，包括街道、河渠、坊巷桥梁等等，很大部分至今仍然沿用。”^② 特别是绍兴古城作为春秋时期流传下来的城市实例，在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城市功能的行政性，城市规模的稳定性和城市文化的连绵性等方面，更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研究价值。

一、一座按周代礼制规划建设越国都城

在我国现有的大大小小城市中，大抵不外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从一开始就按严格的规划兴建，以后便沿着这个基础向前发展，如绍兴就是。一种是开始时并无统一规划，

① 朱士光：《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 页。

② 陈桥驿：《历史时期绍兴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375—376 页。



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才重新规划，上海也许属于这一类。前者的优点当然是城市定性明确，功能齐全，布局比较合理，遗憾的是后来城市的发展容易受到束缚，难有突破，趋向保守。后者在开始时可能出现无序状态，而对后来的发展反而留有很大空间，特别是一旦进入规划程序后，有序发展将势不可当。

绍兴城始建于越王句践七年（前 490），时值句践在吴国经受三年凌辱后回国之初^①。原来的越国古都，从无余立国到句践继位，千余年间，长期居于会稽山腹地之中。句践深知，要使越国强大起来，实现报仇雪耻、称霸中原的目标，必须把都城从封闭的会稽山区迁到开阔的山会平原上来。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都是国家的象征，国都的稳固与安全与否，是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所以越王句践回国后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定国立城”^②，把都城建设当作振奋民心、团结国人的标志性重大工程来实施。可见，句践对城市建设的性质定位，是十分清楚的，他不仅要建一国之都，而且还把建都与强国方略、称霸宗旨紧密结合起来，这在先秦城市建设史上，恐怕是不多见的。

根据城市的性质定位，范蠡受越王句践托付，在城市选址上采取了与众不同的措施。明确提出“今大王欲国树都，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③在综合考虑城址的地形地貌、环境条件、资源配置和防灾御敌等诸多因素之外，特别强调了地势的平坦广袤和对外的四通八达。这其实就是现代城市地理学中所谓的城市区位问题，城址如若占有区位上的优势，那么对于发挥城市的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对于城市未来的发展与扩张，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范蠡按照上述选址思想，最终选择今绍兴古城所在地为越都城城址。这里地处会稽山北麓、钱塘江南岸，地势由南向北倾斜；东西两翼，又分别以东小江（曹娥江）和西小江（浦阳江）为屏障。依靠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在东西约八里、南北约七里的范围内，依托由会稽山脉没入山会平原后崛起的种山（76 米，高程，下同）、截山（52 米）和怪山（32 米）等大小九座孤丘为城址，建立起越国都城。此后绍兴城市发展的实践表明，范蠡的选址思想是富有远见的，突出表现为：一是城内有山有水，为后来绍兴山水城市及水乡风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二是都城四周平坦广袤，给后来绍兴城市预留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三是以九座孤丘为城基，地质条件稳固安全，而且南来的河湖水系既可利用又能避灾，得使 2500 年城址不变，赓续相继。

在越都城建设中，如何利用当地的自然环境、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和满足当地的人文需求，以实现天地人和谐相处，是范蠡必须考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当他接受建城任务之后，便马上“观天文，拟法于紫宫”^④，并且以“象天法地”^⑤即效法天地、遵循规律为越都城规划的基本理念，把都城建设分两步走。先以种山为依托，筑作“句践小

① 张觉：《吴越春秋校注》卷第八《归国外传》。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城”，“周千一百二十二步，一圆三方。西北立飞翼之楼，以象天门；为两虬绕栋，以象龙角。东南伏漏石窠，以象地户。陵（陆）门四达，以象八风。外郭筑城而缺西北，以示服吴……”^① 这里所谓的“天门”、“地户”、“龙角”、“陆门”、“八风”都是天上地下的对应物，目的是想通过把地上的建筑布局与想象中的天上布局相对应，把人间的建筑秩序模拟成天上的建筑秩序，以反映人与天、与地、与大自然的感性对应关系，这是古人“天人合一”宇宙观在城市建设中的形象反映。

紧接着范蠡又在句践小城以东建“山阴大城”。据《越绝书》记载，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设陆门三，水门三，决西北。^② 山阴大城与句践小城在空间布局和功能配置上，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一是坚持“坐西朝东为尊”^③ 的周代礼制。小城是越王句践的“宫台”所在，具有“城”的性质，大城则承担了都城的其他功能，起到了“郭”的作用，所以《吴越春秋》（卷八）称之为“外郭”。在空间布局上，小城在西，大城在东，这种西城东郭、城郭相连的空间结构，就是“坐西朝东为尊”的周代礼制在都城建设中的实际运用。二是创造性地提出了“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④ 的都城模式。尽管我国历史上曾经作为一统政权或诸侯邦国都城的，大小不下数百处，但是能够在城市规划中统筹组织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的，却是越都城。这种“城”、“郭”组合模式，不仅凸现了“城”以君为核心，“郭”以民为主体的都城规划理念，同时也对“城”、“郭”的不同功能和相互关系作了明确分工和界定，实际上为越都城的规划建设解决了“城”、“郭”方位与功能配置两大难题。

如果与“坐西朝东为尊”的礼制联系起来看，西城东郭、城郭相连的结构形态，对越都城来说，城就是城，郭就是郭，“城”与“郭”是两个不同概念。在这里，句践小城是“城”，山阴大城是“郭”，一在西，一在东，彼此相连，是一种毗邻关系，即“毗邻城”。这是比东汉以后出现的“套城”更早的一种城市结构形态，目前国内已不多见。^⑤ 所谓“套城”，是在“坐西朝东”向“坐北朝南”礼制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城市形态。主要特征就是小城（亦称内城）外面套大城（亦称外城），或大城里面建小城。^⑥ 两者相比，当然是毗邻城出现时间早，更具有历史的厚重感。

① 张觉：《吴越春秋校注》卷第八《归国外传》。

② 《越绝书》卷第八《记地传》。

③ 杨宽先生在对大量考古资料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古代都城的基本结构为：①由小城和大城两部分组成；②东汉以前实行“坐西朝东为尊”礼制，以后转变为“坐北朝南”。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④ “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为《吴越春秋》佚文。参见《初学记》卷二十四·城郭；又见《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三·居住。

⑤ 杨宽先生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一书中提出的东汉以前“西城连接东郭”的都城布局观点，主要依据考古和文献资料。如果当时他能看到越都城“西城东郭”的现存实例，相信他一定会很高兴。

⑥ 朱大渭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套城》一文中认为，“套城是一种重要的军事工程”，建筑的绝对年代，“大多在西晋以后南北对峙时期”。在他列举的37座套城中，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见朱大渭《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9—101页。



二、一个有着 2500 年历史的区域行政中心

当年越王句践委托范蠡建城时，就明确告诉他，这是“立国树都”，建设越国都城，主要给城市赋予行政中心功能。虽然对城市来说，其功能不可能是单一的，除行政中心功能外，一般都有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或者交通枢纽等功能。但对中国大多数历史城市而言，首先是行政中心功能，然后才是其它功能，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因为除去天灾人祸因素外，城市的兴起与衰落，通常都是与政治意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通过政治的干预，可以让城市兴旺、繁荣、扩张，也可以使城市衰落、萧条甚至消失。这种政治意愿在发挥绍兴城市行政功能问题上，确实有着不俗的表现。因为 25 个世纪以来，尽管行政管辖范围有大小不同的变化，但它始终是区域行政中心的所在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左右着区域的发展、变化与繁荣。

越王句践就首先利用这一功能，借越都城这个平台，带领越国臣民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使国力大为增强，最后报仇雪耻、消灭吴国，演绎了一场威武雄壮的历史剧。此后句践虽然迁都琅琊，但绍兴仍然是于越族的经济、部落中心和越国重要的后方基地。即使是周显王三十六年（前 333），越国被楚国打败，越王无疆被杀，失去钱塘江以北土地之后，据有钱塘江以南越地的部族领袖，仍以会稽为都城^①，或为王，或为君，“服朝于楚”^②，继续发挥着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作用。

秦统一中国后，绍兴城作为曾经的越国古都，由于在城市区位、经济条件以及文化资源方面的优势，继续发挥着区域行政中心的作用。至于作用大小，当然取决于在行政体制中所处的行政层级及其行政区划的设置情况。在我国的行政体制中，行政中心只是一个行政区划的管理中心而已。而行政区划的基本要素有四：一是层次，即从中央到地方分若干层次进行管理，如州、郡、县；二是幅员，即区划面积大小，是管理范围问题；三是边界，即国家内部区划之间的界线；四是必须有行政中心。^③ 行政区划的这些基本要素，便决定了行政中心本身一是有层级的，二是有管辖范围的。绍兴城作为区域行政中心，自秦汉以来，多数情况下，是多个行政区划管理机构设置在一起的区域行政中心城市。这里既是县域行政中心，又是府域行政中心，有时还是州域、路域行政中心。换句话说，在中国历代的行政层级体系中，绍兴是个重要的节点城市，不是单一的行政中心，而有多个行政中心设置在这里，层层叠加，形成了县、府（郡）、州同城而治的管理格局。

在这一管理格局中，绍兴地区的行政区划基本上三个层次：一是县级行政层次。

① 吴松弟：《中国古代都城》，商务印书局 1998 年版，第 27 页。

② 《史记》卷四十一《句践世家》，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参见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第八章《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64—165 页。